

261.39

上海反日大罢工

工人出版社

上海反日大罢工

张维桢 韩念龙 周 林 朱学范

工人出版社出版（北京安外六铺炕）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通县曙光印刷厂印刷

开本787×1092毫米 1/32 印张：2.375 字数：48000

1988年3月第1版 1988年3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1-1,550册

ISBN 7-5008-0099-1/K·4 定价：0.70元

紀念上海反日大罷工勝利五
十週年

沈東石寫



序

1936年11月，在日本帝国主义加紧对我国军事侵略、政治压迫和经济掠夺的民族危亡之时，我国工商业的大都会——上海，爆发了震惊中外的反日同盟大罢工。这次大罢工给日本帝国主义以沉重地打击，对广大工人群众抗日救亡的爱国热情给予了极大的鼓舞。毛泽东同志1937年5月在延安召开的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的报告中说：“从1935年12月9日开始的中国革命新时期的第一阶段，至1937年2月国民党三中全会时，告一段落。此阶段内的重大事变，是学生界、文化界、舆论界的救亡运动，红军的进入西北，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宣传和组织工作，上海和青岛的反日罢工，……西安事变，最后是南京国民党的三中全会。这些事变统统都是围绕着中国和日本对立这一基本矛盾的，都是直接围绕着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这个历史要求的。”毛泽东同志的这个讲话，精辟地阐明了上海反日大罢工的性质、作用及其历史地位。

上海反日大罢工的胜利是我党抛弃上海赤色工会“左”倾路线在城市工人运动中的影响，自觉地按照刘少奇同志制定的《关于白区职工运动的提纲》开展斗争所取得的伟大胜利。由于执行了党的正确的方针和策略，得到广大群众和社会各阶层爱国人士的大力支持。因此，这次罢工运动表现了中国工人阶级团结抗日决心和民族气节，成为实践我党提出的抗

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一次成功范例，是我国工人运动史上的光辉篇章。

为纪念上海反日大罢工胜利50周年，陈云同志欣然题词，领导这次罢工斗争的张维桢、周林、韩念龙三位老同志撰写了纪念文章，支援这次罢工的原国民党上海市总工会理事长朱学范同志也写文纪念。现在将这些宝贵的史料汇集出版是很有意义的。

罗 干

目 录

回忆上海反日大罢工的一些情况……………张维楨 (1)

1936年上海反日大罢工

回忆……………张维楨 韩念龙 周 林 (18)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与上海纱厂工人反日

大罢工……………朱学范 (43)

〔附〕上海反日大罢工事记……………马钟岳 (53)

回忆上海反日大罢工的一些情况

张维桢

1936年11月，上海三十多家日本纱厂的六万多工人，举行了反日同盟大罢工。这是继“一二九”学生运动后，在抗日准备阶段发生的一次工人大规模的群众运动。上海罢工爆发后，得到了各界的同情和支持，形成了工学商各界参加的团结对外一致反日的统一行动。青岛日本纱厂工人闻讯后罢工响应，上海、青岛一万名工人的反日罢工，沉重打击了日本在华纺织业，大刹了日本帝国主义的反动气焰惊动了日本朝野，日本情报部门四出搜集情报资料，撰写了长篇调查报告，用以研究对华政策。这次反日大罢工，主要是由上海日本纱厂工作委员会发动和领导进行的。当时上海地下党和全总执行局，都和中央失掉了联系，对于这次罢工的内部情况很少有人知道。这次罢工已经过去五十年了，当年参与领导罢工的同志，有些已经去世了，我们为了帮助人们比较全面地了解这段历史，我想把这次罢工的部分情况做些回忆，以供研究，并且作为纪念这次罢工胜利五十周年的献礼。

1933年1月，由于国民党白色恐怖和王明“左”倾错误，使白区的革命力量受到极大的损失，党中央被迫从上海迁到了苏区，全国总工会也不得不跟随党中央从上海搬到了瑞金。全总搬走后，上海的工运工作由全总执行局负责领导。1935年1月，党的遵义会议结束了王明“左”倾机会主

义在中央的统治，确立了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新的中央的正确领导。这时，上海工人运动中，“左”的残余还没有克服，直到1936年上半年，还沿用着过去长期形成的一套“左”的作法，像刘少奇同志批评的“冒险主义‘教徒’的‘礼拜日’〔注〕等现象还严重存在着。”

我1933年底出狱。1934年，党的关系从中央组织部转到全总上海执行局，担任上海纱厂总工会主任。在工作中，我根据实际情况，对当时执行局有些“左”的错误指示提了些不同的意见，结果被丢掉了关系。不久，“一二九”运动爆发了，我和陈之一在日本纱厂开展救国会工作。执行局见我们工作有成绩，又来找到我们。1936年2月，成立了日本纱厂工作委员会，决定把三千名救国会员转为赤色工会会员，结果多数群众不干了，最后只剩下了七八十个人，为此我们又向执行局提意见。到6月，执行局联络员戴晓云〔注〕找我们来开会，批评我们纱委反对领导，反对赤色工会。下午休会时，纱委周林同志拿来一份从雍文涛处得到的刘少奇同志《关于白区职工运动的提纲》。《提纲》在清算“左”倾错误、总结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对白区职工运动的方针、任务和一系列策略问题作了正确的规定，特别是强调利用一切公开合法身份去组织群众，开展斗争，“暂时放弃独立组织赤色工

〔注〕批评党内冒险主义，不顾敌人白色恐怖下的各种客观条件，在纪念节蛮干，使党的力量受到难以计算的损失。详见刘少奇《肃清关门主义与冒险主义》一文。

〔注〕戴晓云1924年任团长长沙地委书记，1926年任中共湘南特委书记，1930年任全国互济总全党团书记兼主任，1931年1月被撤职（并开除党籍），后曾在全国总工会上海执行局工作。

会的任务”。我们看了《提纲》非常高兴。第二天再开会时，我们把《提纲》交给了戴晓云，他说拿回去研究研究。从此，会上的气氛就缓和了，只是撤了我日本纱厂工作委员会主任的职务，改由韩念龙同志担任。6月以后，我们纱委同志都下去发动群众，按照《提纲》的精神开展工作。我根据会上的分工，来到了沪西丰田纱厂开辟工作。在丰田组织开办了一个平民学校，我以教师身份为掩护，建立了一些工作关系，发展了七名救国会员，并且吸收了平民学校校长朱永康入党，很快工作就开展了起来，为反日罢工打下了较好的基础。

1935年底，爆发了北平学生要求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一二九”运动，推动了全国抗日救亡运动的蓬勃发展。上海日本纱厂的工人，直接受着日本侵略者的剥削和压迫，生活非常痛苦，特别是“一二八”事变以后，日本资本家为了把战争和几年来纱业不景气的损失转嫁给工人，普遍加重了工作负担，减少了工资收入，使得工人活不下去了。在全国抗日救亡运动高涨的形势下，上海日本纱厂工人的反日情绪日益发展起来，在他们当中酝酿着一场要求增加工资的斗争。

在1936年的下半年，纱业转旺，日本纱厂加紧生产，礼拜天还要加班。华商和英商各纱厂也都开了三日班或五日班。这样，工人的劳动强度加重了，工资收入并没有增加，因此，有的华商纱厂举行了罢工。到了10月底11月初的时候，日商上海五厂和四厂的工人，为反对开除工人，要求增加工资，也先后发生了罢工或怠工。这两厂的罢工，虽因缺乏领导和组织，但它却反映了日本纱厂工人普遍的情绪。这事引起了我们的注意，我们想借此机会，发动全上海日本纱厂工人的大罢工。

11月6日上午，日本纱厂工作委员会在韩念龙处召开了会议。这天除了陈之一有事外，韩念龙、周林、郭光洲和我都出席了。会议内容是讨论这次准备已久的反日大罢工。在这次会上，同志们分析了日本纱厂工人不断高涨的反日情绪，分析了日本纱厂工人要求增加工资的情况，一致认为，日本纱厂工人的反日大罢工，处于一触即发的形势，反日罢工的条件已经成熟，应该立即发动罢工。会上根据《提纲》精神，讨论了如何争取罢工胜利的问题。周林同志提出，这次罢工应该明确的争取胜利、适可而止和中国厂不罢工的指导思想。这个指导思想在《提纲》中写得很清楚，所以大家都表示赞成。当时我们认为，罢工必须提出群众最为关心的经济要求，必须以解决群众最关心的生活问题为内容，这样，群众就会全力为实现这个纲领而奋斗。对于反日的政治口号，无须写在纸面上，工人罢工就是政治，就是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政治斗争。否则只能是授人以柄，吓了群众、帮了敌人，给敌人镇压罢工以借口。于是，我们在这种认识的基础上，提出了增加工资10%等罢工斗争的五项条件。为了争取罢工斗争的胜利，我们专门讨论了如何发挥统一战线的作用，争取社会各界的同情和支持。为了保证这一工作的落实，会议安排郭光洲和韩念龙两人负责这方面工作，与救国会取得密切的联系。此外，会上成立了罢工指挥部，大家推我为负责人，作为这次罢工的总指挥。最后我们研究了罢工斗争的计划。决定这次罢工首先由周林同志发动同兴工厂、大康纱厂和上海二厂和三厂罢工，这些厂内我们的力量比较强，宗瑛同志在同兴工厂工人中，有较高的威信。接着，由韩念龙和陈之一同志分别发动公大纱厂和裕丰纱厂的斗争。整个沪东工人起来以后，由我组织沪西的罢工，最后形成全上海

的日本纱厂反日同盟大罢工。这样才能迫使日本资本家接受罢工的五项条件，夺取胜利。会后，我根据大家提出的五条要求，整理写成了罢工宣言的传单，经过征求厂内干部和积极分子的意见，定稿以后，交由中国征信所印刷厂的何孝章、冯伯华等同志铅印。宣言的下款没有讨论过，是我临时决定以日本各纱厂工人代表的名义署名的。宣言全文如下：

上海各东洋纱厂工友公鉴：

亲爱的工友们，你们快起来吧！东洋老板是没有良心的，他弄得我们东洋厂的工友快要苦死了！我们各厂的代表会议认为：现在已经到了忍无可忍的时候了，不得不依靠我们群众的团结的力量，快预备联合起来罢工吧！我们要向厂里要求他们马上答应下列条件：

- 第一，要加工资10%；
- 第二，吃饭要停车一小时；
- 第三，不准开除任何一个工人；
- 第四，不准拷打任何一个工人；
- 第五，反对礼拜天多做钟点。

望我们东洋厂里的工友，大家赶快在车间里商量好，齐心出力，以争取我们最后的胜利！

内外棉、上海、喜和、裕丰、同兴、东华、日华、公大、丰田、大康等厂代表同启。

由于同志们的共同努力，纱厂工人的积极响应，沪东日本纱厂的罢工，按照预定的计划实现了。11月7日即纱委会议的第二天，在周林同志的发动之下，首先是同兴二厂和上海二、三厂罢工，其他各厂立即响应，11月8日晚，上海纱厂一、二、三、四、五厂，同兴二厂，东华纱厂等男女工人，共一万五千余人参加了罢工。

沪东罢工的爆发，使得上海的中、外统治者十分惊慌。

日本海军陆战队立即分驻各纱厂，还派出军车、装甲车和摩托车队在罢工区的马路上巡行。榆林路、格兰路的巡捕房，都派出大批中、西侦探和巡捕去进行弹压。

11月9日，我们把题为《上海各东洋纱厂工友公鉴》的传单，通过积极分子秘密分送各厂罢工工人，并广为散发和张贴，沪东、沪西和浦东所有的日本纱厂工人和资本家，都能看到这个传单，所以在社会各界影响很大，罢工工人看了也很受鼓舞。这个传单，既是罢工斗争的纲领，又是罢工的宣言，同时也是工人向日本人提出的五项条件。传单的散发，推动了罢工运动的发展。

11月10日，在席宋荣、宗瑛等同志的推动下、大康、公大、裕丰等各纱厂也先后罢工，迅速形成了整个沪东地区日本纱厂反日同盟大罢工。

沪东罢工爆发后，日本人做了种种的表演。11月10日，日本纺织业公会会长船津辰一郎，对我们的联合宣言作出了反应，他说：“工人提出条件为传单形式，不能视为正式条件。”表现出了一副对工人罢工毫不在乎的样子，而仅过一天，很快就露出了害怕罢工、乞求工人复工的真实嘴脸。11日早晨五点多钟，大康纱厂在海军陆战队的“保护”下，调用四辆卡车，把夜宿在工房的包身工强行运到厂内开工。但是，由于三分之二的工人不住工房，纱厂生产是流水作业，只有部分工人进厂是不能开工生产的，所以只好把强拉进厂的包身工又放了出来。还有的纱厂买很多大饼发给工人，以求他们复工，生产。当然，船津的讲话还有“钓鱼”的意思，我们没有上他的当。

沪东罢工爆发后，迫切需要有⁷⁰个坚强严密的组织，公开领导这场罢工斗争，为他们出谋划策，帮助解决各种困难，

夺取罢工的胜利。群龙无首是不能胜利的。为此，11月11日上午，我们在华德路黄兴路广场召开大会，准备成立公开的罢工委员会，到会两千多人，国民党上海市总工会也来了一支队伍，打着“上海市纱厂工人请愿团到市府请愿去”的旗帜到了会场。在开会前，公共租界的巡捕，包打听，国民党警察、密探，已密布会场，颇有大打出手之势。我们当时见事不妙，为避免同敌人硬碰，马上决定大会不开了，让工人们同国民党上海市总工会那支队伍联合行动，同他们一起去市政府请愿，共同向日本资本家进行斗争。原定的大会另作了安排。

我们临时的决定向下通知后，两千多群众离开广场奔向市政府。罢工工人的请愿队伍，一路上不断受到沿途军警的阻拦，到了市政府只剩下一千人。根据社会局第三科调解员朱圭林的要求，只允许推举出的13名代表，跟朱圭林进入了社会局。社会局的调解主任王先青接见了工人代表，王开始摆开架子，声斥工人罢工是胡闹。工人代表宗瑛等历数了日本老板残酷剥削压迫中国工人的事实，申诉了日本纱厂工人罢工和向厂方所提五项条件的正义性，并且声明工人罢工是日本人压迫虐待的结果，不能视罢工为胡闹，呼吁中国官员应该支持工人罢工，共同反对日本资本家，要求中国政府为日本纱厂工人说话，要日本厂主答应工人提出的五项条件。王先青经工人代表据理申辩而理屈词穷，只得连连劝告工人代表暂先回去，由他负责向上报告工人情况和要求。工人代表在驳斥了王先青的澜言，表达了工人的要求之后，适时结束了这场请愿活动。

沪东工人罢工爆发后，郭光洲、韩念龙等同志与救国会沈钧儒、章乃器等取得了联系，向他们介绍了罢工形势和日

本纱厂工人牛马不如的生活，争取他们的支持和帮助。11月12日下午，上海各界救国联合会、上海妇女界救国会、上海文化界救国会等爱国团体，联合以孙中山先生诞辰纪念大会的名义，在静安寺路女青年会举行了大会。沈钧儒、章乃器、王造时等著名人士参加大会并发表了演讲。沪东罢工工人中，一个女工代表登台发了言，呼吁各界支援沪东日本纱厂的罢工斗争。她的发言受到了全场长时间热烈的鼓掌欢迎。接着是两名男工代表发言，他们介绍了日本纱厂工人惨遭迫害、深受剥削和这次罢工的情况，得到大家的同情。大会发言的还有文化界救国会、大学教授救国会和国难教育社的代表。大会一致通过了成立支援日本纱厂罢工委员会的决议，支持工人的罢工斗争。这对日本纱厂工人的罢工是一个很大的支持和鼓舞。会后还为支援纱厂工人的罢工进行了募捐。

上海各界救国联合会的沈钧儒、章乃器、李公朴、王造时、史良、沙千里、邹韬奋等七位领袖，不顾个人的劳碌和安危，积极呼吁各界援助日本纱厂工人的反日罢工。因此被中日反动当局怀恨在心，终于11月22日夜，被敌人无辜逮捕，因此引起了全国各界人士的公愤，一致谴责国民党蒋介石政府。

沪东工人罢工坚持了几天后，国民党当局和日本资本家对罢工进行了种种破坏，一部分工人生活发生了困难，群众情绪不太稳定。一些生活困难的工人怕厂方开除而进厂复工了。罢工指挥部于11日下午及时研究了这种情况。我们认为，日本纱厂工人的工资低，救国会捐助的米票又有限，工人生活确实有困难，再加上敌人的威胁和欺骗，致使一部分工人不能坚持。因此，我们对复工工人不宜阻拦，不能造成

工人队伍内部的隔阂和分裂。这时正是纱厂月中发工资的时候（纱厂月中13日至15日发工资），不如让大家领了工资再罢工。于是我们决定，所有厂内的干部和积极分子，同工人一起进厂复工，先领工资，用事实揭露日本人欺骗工人的阴谋，争取工人队伍的团结。指挥部会议结束后，我立即离开了沪东，全力发动沪西日本纱厂工人的罢工。

沪东工人决定复工后，我立即回到了沪西，发动沪西日本纱厂的罢工。首先，向厂内干部和一些主要的积极分子分别介绍沪东罢工的情况，解释了五项要求的内容，向他们布置了工作。小沙渡一带日本纱厂的罢工，主要是通过宗瑛的妹妹宗云和蒋阿二等人的关系去发动，让他们周围的小姐妹跳厂，发动内外棉等一些纱厂的罢工。我自己把主要精力放到了丰田纱厂的工作上。

我来到沪西后，为了加强荫蔽的斗争，除了继续以平民学校教师身份为掩护开展工作外，还把陈晓凤同志调到丰田纱厂布机车间来做工，开展女工工作，而且通过她，同朱永康等同志建立密切的联系，加强秘密指挥工作，陈晓凤同志在丰田罢工中，是发挥了重要作用的。为了鼓动群众的情绪，我们派人在工房附近叫卖公开发行的报纸《立报》等，利用公开的报纸为我们宣传沪东罢工的声势，宣传工人斗争的情况。此外，我们还计划安排沪东罢工代表来平民学校作报告的活动，介绍沪东的情况。这样，丰田工人的斗争情绪很快就鼓动起来了。

丰田工人情绪的变化，引起了日本人的注意，公安局也如临大敌，加强了戒备。11月13日，市总工会的人来到了丰田，找老厂朱永康等五个男工去谈话，表示愿意领导丰田工人反对东洋人，告诉他们不要上共产党的当，并且约定第二

天上午九点钟，在丰田平民学校商讨罢工的办法。当天深夜，朱永康从家翻墙出来，到石家宅我的住处来找我，向我汇报情况，研究办法。我们根据情况分析，市总工会14日上午来人商讨罢工的办法，这正是沪东代表报告的时间，公安局可能来人监视我们的活动。为了保证沪东代表的安全，我们决定取消这次报告活动，派人通知沪东代表不要来。我们那天晚上决定，不要回避市总工会的来人，要以诚恳的态度，相机表示愿意接受他们的指导，共同反对东洋人。

11月14日，市总工会的人来了，后边还有两个带枪的，不知道他们是什么人。朱永康看到这种情况就躲避起来，没有见面。

15日，平民学校内有一些生人出入，显然是对朱永康进行了监视。当晚，朱又翻墙来找我，汇报了两天的情况，研究了问题。我们认为，丰田工人已经发动起来了，群众情绪很高，发动罢工的条件已经成熟。我们决定在18日早晨工人换班时，新老两厂同时罢工。根据当时情况分析，在罢工的前后，朱永康等同志有被敌人逮捕的可能。怎么办，躲藏起来吗？那就意味着放弃对罢工的领导，无论如何也不能那样作，逃避被捕就是断送整个罢工的前途。只能采取积极的措施，作好应付各种事变的准备。在这天夜里，我们决定：

一、以原救国会会员和学校学生为基础，组成一支中心队伍，充实领导力量，以此作为发动群众、领导罢工的骨干力量，同时又是一支保护安全的队伍。

二、采取公开、合法的形式，同敌人作斗争。在罢工实现后，召开群众大会，成立罢工请愿代表团（内部叫罢工委员会），通过罢工的条件，由代表团带领全厂群众去市政府请愿。代表团设立临时办公处，并向公安局、社会局备案。

三、沪东罢工的五项条件，在丰田工人中反应很好，因此，作为丰田工人罢工的条件。

此外，我们还商定了罢工请愿代表团、纠察队和交通队的负责人名单。

16日，经过一天紧张的活动，在丰田纱厂组成了一支192人签名参加的骨干队伍。这些人宣誓表示，为了罢工斗争的胜利，愿意和大家共生死。

16日下午，一个姓高的工人在路上被逮捕，晚上朱永康在家被逮捕，情况十分危急。我马上通知王泽民，让他代行朱永康的领导工作，提前于17日下午六点钟，新、老两厂同时罢工。

17日下午，丰田老厂的日本人，发现工人情绪有变化，即把各车间的铁门上了锁，隔绝了各车间之间的联系。六时许，老厂工人罢工了，他们打碎了铁锁，冲向厂门。这时，在厂门外荷枪实弹的日本海军陆战队，已经架好机关枪，枪口对着将要冲到厂门的工人。跑在前边的工人急中生智，一拥而上包围了站在门里的几个日本人，并且高声警告门外持枪的敌人：如果你们敢开枪，就让他们（指被包围的日本人）同归于尽！另一部分冲来的工人，见此情况，立即转向总写字间，截断了电话，和房间里的日本人搏斗起来。还有一部分工人，回到车间拿起铁锤、铁棍和筒管作武器，愤怒地打坏了一些机器，并且准备同敌人战斗。急剧发展的事态，出乎日本人所料，霎时慌了手脚，不知所措。这时，工人越聚越多，不断从各车间陆续拥向厂门口。日本帝国主义的海军陆战队，在机智勇敢的罢工工人面前，在声势浩大的罢工工人的威逼下屈服了，不得不下令撤退。至此，丰田老厂五千工人的罢工实现了。他们带着反日的满腔怒火，冲出厂